



陆小聪 主译

Lilun Quanshi

Tiyu yu Shehui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

Theory, Sports & Society

约瑟夫·马奎尔 凯文·扬 主编

Joseph Maguire Kevin Young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

Theory, Sports & Society

约瑟夫·马奎尔 凯文·扬 主编
Joseph Maguire Kevin Young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ory, Sports & Society, BY Joseph Maguire, Kevin Young

ISBN 0-7623-0742-0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1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版贸核渝字(2011)第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马奎尔

(Maguire, J.), 扬(Young, K.)主编;陆小聪主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2

书名原文: Theory, Sports & Society

ISBN 978-7-5624-6295-8

I. ①理… II. ①马… ②扬… ③陆… III. ①体育运动社会学—研究 IV. ①G8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0307号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

约瑟夫·马奎尔 主编
凯文·扬

陆小聪 主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杨敬 陈力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姚胜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5 字数:382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295-8 定价:3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体育、文化和社会的社会学观察

中文版前言

◎ 约瑟夫·马奎尔

任何将体育和社会割裂开来所做的体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要想更好地理解社会(体育如何反映并强化社会结构和亚文化),就必须经过理论研究和经验调查。体育和社会的有关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社会学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观察,而且有助于分析和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模式。理论和事实的相互影响是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目的在于寻求对历史、个人史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因此,体育研究不仅可以解释不同体育运动的亚文化,而且也可以解释体育所处的社会。透过某些看似平凡、不严肃的体育现象,社会学家可以看到社会和人类生活严肃、重要的一面,并阐述不同理论观点所提供的深刻见解,这就是编辑本书的目的。以下,我将从体育比赛中冠军的作用和意义角度出发,来阐述体育和社会的关系。

成为体育比赛冠军意味着什么?对于不同文化和文明(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来讲,他们为什么如此意义重大?简而言之,冠军就是在参赛者和竞争者中的第一名。就此而言,“冠军”指的是个人或者团队赢得比赛的一种能力。然而,在英语中,“冠军”这个词的词源表示了不同的含义,并且给我们提示:为什么冠军比他们赢得比赛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赋予冠军这样的意义。在英语中,“冠军”一词最初用于中世纪的骑士比武中,指的是他人的拥护者或者捍卫、拥护或支持某一事业的人。

从这个意义来讲,运动员不单是体育比赛的拥护者,也是当地社区和国家的拥护者,有时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拥护者。一个最杰出的例子就是美国拳击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冠军需要有特殊的才能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他们上演“奇迹”,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类似于张艺谋在影片《十面埋伏》中刻画英雄。成为冠军的运动员是我们文化价值观的象征,我们也希望他们如此。冠军是拥有天才的人,但作为英雄,他们是在向我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从跨文化角度来讲,人们欣赏卓越并追求卓越,即使不这样,那么至少也共享卓越。冠军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我们可能的样子:作为我们的代表,冠军使我们成为间接满足的人类。他们是我们的当代英雄,因为体育已经成为不同群体自我表露的公共场所。也就是说,现代体育是代理宗教和流行剧场的一种形式,人们在其中进行自我表露。运动场是当代体育比赛场所,在这里我们把冠军视为

英雄,体验兴奋的神圣时刻,同时抛却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需要把冠军视为英雄。他们发挥着为自己、当地社区和国家实现体育成功的显功能。同时他们也发挥着一定的潜功能:他们必须体现最被社会看重的要素。作为理想化的产物,他们提供灵感、动力、方向和生活的意义。作为英雄,他们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以一种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是“现代”体育发展的过程。19 世纪的先驱者将体育与西方强身派基督教联系起来:无私、自制、公平、绅士风度和道德高尚。这本身就补充了传统的骑士精神:荣誉、体面、勇气和忠诚。这些品质正好与英国足球运动员鲍比·查尔顿爵士以及近期冠军们的某些特征有关。

尽管鲍比·查尔顿体现了高尚的体育意识,但仍有一些因素威胁着冠军作为英雄的显功能和潜功能。这起源于一些有关真实性和正直性的问题,冠军的地位有赖于比赛的真实性。如果体育比赛中充斥着腐败、作弊、兴奋剂和赌博丑闻,那么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就会打折扣,比赛也不再是追求卓越或者不同群体自我展现的社会舞台。当体育变得太虚假、被操纵或者毫无悬念,它便缺失了真实性。职业摔跤也会产生“冠军”,但却不被人们重视,他们不会成为我们的英雄。此外,如果冠军代表着一个不被民众支持的国家体系,对他们的尊重就会缺失。换言之,运动员可以成为抵制的符号,透过他们可以窥见不同的社会制度。

作为英雄,冠军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特别看重的要素。但是,冠军的正直性也有可能通过几种方式被损害。冠军可能是有缺点的天才——或者是因为骄傲自大,认为没必要把精力用于比赛准备和表演所需要的高度和强度,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私生活违背了作为英雄的身份。议论至此,就会想到爱尔兰人乔治·贝斯特和英格兰人保罗·加斯科因的例子。尽管人们对贝斯特的死亡表现出极度的悲伤,但是他们作为运动员的理想形象受到了破坏。此外,有时我们的冠军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名人——他们有名但并不是英雄。大卫·贝克汉姆可以视为这种类型。假使事实如此,这样的名誉是短暂的,他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有名的体育明星可能名噪一时,但既不是冠军,也不是英雄,很多现在已经被遗忘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冠军对于我们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思考体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是社会学理论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也是本书中的观点对于理解社会与体育的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因。

体育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搁置。然而,它更是其所处的社会的高度象征,植根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潮流之中。在体育的场景中,我们既可以经历日常生活中很少有的兴奋,也可以与同组的参赛者和观众进行交流,把在日常生活中隐藏不漏的东西在体育运动中展现出来。体育是现代道德剧,展现人类作为个体、群体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真理。因此,从情感来讲,体育使我们感动;从社会来讲,它与我们密切相关。体育发挥的这些功能涉及几个原因,这与冠军的作用相吻合,并突出了冠军的作用。

体育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引起令人愉快的激动。在控制不断增强、逃避风险的社会中,人们似乎需要体验各种自发的、基本的和轻率但愉快的兴奋。在体育

比赛中,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都寻求压抑后的情绪释放。这样,情绪得以自由释放,并且是以引出和模仿在真实生活情景中产生兴奋的方式。因此体育是一种模拟活动,它可以提供模拟的独特场景使情绪自由释放。这种兴奋由情绪上的紧张引起,这里的紧张包括:想象的或可控的“真实”危险,虚拟的恐惧或满足、悲伤或欢乐。这种压抑后的兴奋释放使得各种情绪在这一虚拟的情景中被唤起,这些情绪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翻版。我们的冠军被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技术造诣,而且也因为他们和我们共同经历的情绪,以及比赛的精彩或刺激。

网球比赛中的抢七、足球比赛中的点球决胜以及高尔夫球加时赛中的突然死亡都会导致一系列的情绪变化,这些情绪变化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在比赛结束时精疲力竭。而且,这不同于精心策划的戏剧或电影,我们知道所目睹的体育比赛是真实存在的,比赛的结果也不是事先确定的。有时,我们的冠军会在实现他自己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的梦想,但有时候,肯定也要经历失败的悲剧。比如,网球冠军罗杰·费德勒,他一走进伦敦温布尔顿网球中心,就可以看到一块牌匾,上面刻有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如果》。诗句的意思是:当你遇到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必须用同样的心态来看待它们。在温布尔顿决赛中面对胜利与失败时,费德勒可以说是体现出了这样的情操。

只有当体育运动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个人意义相联系时,它们才会被体育迷所重视。因此,重大体育赛事为体育迷提供了集体参与和认同的机会,进而成为颂扬和强化共同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方式。正因为体育是一个将日常生活暂时搁置的领域,所以它们才能够颂扬由冠军所表达和体现出来的共同文化内涵。与体育比赛联系在一起的国歌、国徽和国旗强调了冠军代表的是一个国家。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足球队就被赋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他们的成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到现在依然激励着英格兰球迷。当时的英格兰足球队队长鲍比·摩尔的神圣形象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体育的象征意义以及冠军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单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深刻。鲍比·摩尔成为比获胜更有意义的象征符号。

如果可以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社会认同得以形成,并得到检验和发展,那么体育便可以看作是社会生活的理想形式。体育比赛的规则和章程(比如高尔夫球礼仪)要求比赛的公平和对能力的真实检验。在真实可靠的比赛中获得“真正的”冠军就是对此最好的表达。在这样的场景中,有可能建立起比现实社会生活中更加一致、更加可靠的确定性。我们强调比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坚持严格的规则和公平的实施——因为我们希望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等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相互干涉,控制着现实社会中的比赛及结果。如此一来,比赛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成为亵渎的假象。但是,在比赛场上,体育比赛的结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是真实、可靠的,那也是冠军总是试图击败同类冠军的原因所在:这是真正的比赛。事先就知道你将会打败级别低的对手是不会赢得荣誉和尊敬的。1970年英格兰

和巴西进行世界杯比赛时,鲍比·摩尔和贝利的赛场握手象征着这样的荣誉和尊敬。虽然迭戈·马拉多拉是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他的“上帝之手”不会赢得这样的荣誉和尊敬。

如此看来,体育运动是一场象征性的对话:它象征着对话应该如何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因此,体育涉及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能会是谁的戏剧性表演。体育场就像一个剧场,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系列不同的情感愉悦和兴奋:在比赛中,兴奋随着结果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但它的意义在于我们从情感上、精神上 and 社交上进行了投入和付出。作为我们的英雄,冠军既体现了其神奇的一面和受人尊敬的社会价值,也体现了构成体育参与基础的体育道德。为了展示他们勇敢无畏和正直的特征,他们不得不承担风险。这就是我们记住他们的原因,就像我们记住电影《十面埋伏》中的主人公小妹、金捕头和刘捕头一样。有鉴于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研究全球体育和社会当代风貌的文集,它可能会潜在地提供研究中国武术的理论视角,也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英文版前言

如果说社会学的前景除了在于它能够拓展我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的理解,还在于它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事件和社会模式(Ritzer,1992),那么体育社会学的前景也一定同样在于它能够解释这样一些事情:与体育有关的行为、过程、结构、制度和经历。只有超越描述的层面达到理论的高度,解释才能够实现。就这一点而言,在它的分支学科中,整套社会学理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是广泛的,这使得我们对有关体育现象的理解,虽然不是彻底的,但也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

与艾伦·克莱恩认为处于日趋消亡状态的另一个与体育有关的分支学科——人类学(见第6章)相比,体育社会学似乎正如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一些优秀的期刊,大量的地方组织、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许多获得认可的专业会议就是几代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虽然体育社会学早期阶段(体育本质上往往倾向于优先采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的经验主义者还没有湮没无闻,但是公正地说,这一分支学科在过去的40年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来自日益增长的理论阵营中的学者们的大胆创新。

我们可能有理由仍然把体育社会学视为一个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次要领域(Ingham & Donnelly,1997),但是,很显然,那些用于研究与体育有关的行为、过程和结构的理论方法并不比那些人们认为更成熟、更复杂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逊色。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分支学科所采用的方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也不意味着所有方法都以相同的比率,在同一时间被使用,或者是他们的确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举例来说,有些理论只是在使用中比其他理论更显著(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变种和文化研究在大西洋两岸被广泛采用(见第7、15和16章),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使用已经明显减少(见第2章));有些理论只是在这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比其他理论更显著(例如,女权主义的支配地位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性别视角的主流转变——见第5章和第13章);有些理论在影响力方面比其他理论更持久(例如,我们可以说源自韦伯和米德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和理解社会学的分支已经留下了比米什所说的“永久的遗产”——见第1、3、4、7、12、15和16章);有些理论似乎即将获得认可,也将越来越流行(例如,在一个日益“断裂”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已经使得一些学者承认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价值——见第8章);还有另

外一些理论,尽管具有广阔的前景,然而奇怪的是没有被充分利用,在我们看来,这样从总体上不利于这一学科的发展(例如,型构社会学虽然在许多国际背景中,包括亚洲国家,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直到最近它仍然被北美的学者所忽视——见第9和13章)。

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理论在这一学科中的相对贡献和相应表现本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在《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中讨论的理论几乎都不是统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样一来,就更棘手了。例如,与强调思想意识和文化作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注重经济因素;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也有不一致的地方;结构功能主义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变种。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正如瑞泽尔(Ritzer, 1992: 508)所言,“很显然,许多社会学理论正在互相借鉴,并且跨越了社会学分析的多种层次,结果导致理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然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就像先于我们的许多学者(e. g., Koakley, 2001)所做的那样,没有理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并且每一个理论都有长处和缺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一开始征集本书各篇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撰写者必须考虑到学生读者,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做到内容详细和逻辑严密。我们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讲授社会学而不知道学生认为理论是复杂难懂、枯燥乏味并且令人惧怕的是不可行的(Hadden, 1997: 11)。我们发现,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恐惧心理使得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刻意推迟选修理论课。然而这使他们失去了更好的理解其间他们所选修的“相对容易的”课程内容的机会(作为一门大学讲授课程,统计学有遭遇到相同命运的趋势)。诚然,社会学理论可能是复杂难懂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理论家却以艰涩难懂的写作风格而著称,再加上社会学是一个公认的充满术语的学科,讲授者还可能会采用缺乏想象力和抽象的教学方法,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理论给学生带来的困难和忧虑。但是理论可以不必如此难以理解或是令人感到可怕。例如,采用布斯和洛伊的“作为楷模的经典思想家”的观点,学生可以很容易理解现代体育的种种理论。

我们认为,无论是根据韦伯“工具理性”(见第3章)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还是把体育系统看作政府和政治工具来研究,把受伤的或者健壮的身体作为转让资源(见第1章)来研究,还是把基于体育而产生的认同和职业作为复杂的互动仪式的结果(见第4章)来研究,“经典的”社会学思考方法对于所有学生来说都是可能的。同样,也有更多的现代理论提供了深刻的、便于学生掌握的方法来理解这样一些情形:与足球有关的暴力和全球化趋势(见第9章);一些社会阶级团体和文化背景更容易影响某些特定的运动和娱乐活动的方式(见第6、7和10章);身体健美和锻炼受到社会印象、社会规范和社会义务“支配”的方式(见第12章);体育运动和体育经历反映人们社会网络结构的复杂方式(见第11章);以及新体育场馆的地点和建造与当地权力精英要求互相影响的方式(见第14章)。简言之,通过合理使用构成他们所观察到的周围世界的具体的、

有意义的实例和议题,惧怕理论的学生也可以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毕竟最能与人们产生共鸣的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内容”。上面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复杂难懂的或者不可预知的,但是如果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直接的联系是必要的。而且,本书中随处可见这种联系。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是“体育社会学研究丛书”的开端之作。考虑到学生和同行的需要,我们打算通过回顾一些已经被用于解释体育过程的理论观点来开始这套丛书。作为编者和研究者,我们难免会给本书中所讨论的理论观点加入一些我们自己的理论偏好。对于我们中的一位(e. g., Maguire, 1999)来说,这意味着探究形态理论的价值,而对于另一位(e. g., Young, 1993)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更为其所爱。然而,我们认为,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互相排斥的或者是穷尽的实体既不是一个有益的,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观点,在此立场上,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再次梳理本书中各种不同理论的基本要点,尤其是将它们进行比较和对比,只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此的决心。

人们通常认为编辑过程涉及大量工作:校对,审核,整理,润色等。编辑的确包括这些工作,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评估、重新思考和反馈的过程。可以说,编写本书的过程给我们很多启迪。我们感谢每一位贡献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据我们面前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过去和当前工作的机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时会意识到我们把型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某些内容和符号互动论或者女权主义理论融合在一起(Maguire, 1992; Maguire et al., 2002; Young and White, 1995),此时,我们实际上忽略了这些理论的丰富和潜能。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估我们认为不够充分、不够成功、缺少社会学意味的理论方法的机会。在导言中我们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一书对那些已经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一个虽然不是彻底的,但也算是比较全面的评述。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都包含在里面,许多跨理论的尝试也列在其中,因为它们意识到前面所说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理论可以宣称“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各种不同的理论进行思考,使研究体育的学生和学者能够感受到体育社会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广泛的解释性的思想,而且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体育过程和社会关系中。

参考文献

- Coakley, J. (2001). *Sport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McGraw Hill (7th edition).
- Hadden, R. (1997). *Soci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 Ingham, A. G., & Donnelly, P. (1997). A sociology of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 of sport: Disunity in unity, 1965-1996.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4(4), 362-419.
- Maguire, J. (1992). 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sport and the emotions: A proces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E. Dunning and C. Rojek (eds),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sing Process: Critique*

and Counter-Critique (pp. 96-120). London: Macmillan.

Maguire, J. (1999). *Global Sport: Identitie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Ritzer, G. (1992).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

ory. London: McGraw Hill (3rd edition).

Young, K. (1993). Violence, risk, and liability in male sports culture.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0(4), 373-396.

Young, K., & White, P. (1995). Sport, physical danger, and injury: The experiences of elite women athletes.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19(1), 45-61.

致 谢

与其他任何编辑出版一样,没有众人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要感谢《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这本书的各位撰稿者,感谢他们在我们等待最后几章稿件的到来和综合编者建议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宽容。我们感谢埃尔泽菲尔出版社的安·玛丽·达文波特和莱斯利·罗伯茨,他们在这项工作的不同阶段给予了指导和帮助。苏珊娜·怀曼和米歇尔·贝里协助整理了部分书稿,非常感谢他们两位。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教授过的学生,他们对社会学的好奇心使他们勇于挑战理论问题。多年来,他们的见解和疑问不仅使我们意识到了理论以及社会学所关心的不确定之处,而且在促使我们坚决、合理地挑战我们偏好的理论所做的工作方面,他们的见解和疑问也被证明是千金难买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埃里克·邓宁。虽然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受到了许多人的影响,但不仅我们,而且实际上其他同行也都认为没有哪一个社会学家比他(埃里克)更加对职业尽职尽责。我们认识埃里克已有 20 多年,如果他在该领域的广博知识和理论理解力的一小部分让人们受到熏陶,那么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将会更加丰富。

目 录

导言

“回到未来”:对体育的社会学思考	1
------------------------	---

经典问题

1 卡尔·马克思留给体育社会学的不朽遗产	18
2 埃米尔·涂尔干,结构功能主义和体育社会学	29
3 马克斯·韦伯与体育社会学	44
4 乔治·赫伯特·米德与理解体育社会学	58

当前话题

5 运动,性别,女权主义	74
6 体育人类学:远离过去与建设未来	90
7 体育文化研究:一种干涉主义的实践	105
8 后现代主义和体育研究	124

潜在综合

9 型构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贡献	146
10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和体育实践	165
11 社会网络方法下的体育研究	186
12 米歇尔·福柯:体育,权力,技术与治理术	203

未来方向

13 女性主义和型构社会学:对话与潜在综合	220
14 地方政治经济学:城市和体育研究视角	232
15 符号互动论和文化研究:在批判民族志中的运用	245
16 身体,亚文化和体育	260

附 录

中英文译名对照表	275
译后记	279

“回到未来”： 对体育的社会学思考

导
言

‘Back to the Future’: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about Sport

◎ 约瑟夫·马奎尔^① 凯文·扬^②

乍看之下,本书的构成基础在于它第一次把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体育的专家汇集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本书概述了体育研究中不同理论间的激烈争论(Jarvie & Maguire, 1994)。我们认为本书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同样有益。不过,在本书的结构和导言论述中,我们还有第二个计划,那就是引导那些与体育社会学有关的人士重构他们的想象力,重新考虑他们思考以及谈论体育、文化和社会的方式。

构成本书的文章可以表明,体育社会学是一个处于上升中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大量富有洞察力的研究正在进行。然而,我们之所以引导大家重新思考、重新展望,是因为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两大危险,要穿越这些危险就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构成“好的”社会学实践的技巧。我们必须从社会学的起点返回,必须“回到未来”,重新探讨社会学研究的根源,以此来检验我们的技巧和抱负。

那么,接下来,我们发现的危险是什么呢?首先是拘泥于“此时此处”,只解决短期问题的倾向。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抵制那些推动体育管理、体育政策以及体育教育科学工业联合体的“应用知识”观的主张。这些研究模式典型地将注意力集中到短期“社会问题”和具体“利益群体”上,并且往往采取草率的和非理论的方式。他们“窃取了我们的衣服”——按理说,是我们下一代学生的学术立场。体育社会学批判和怀疑的特点消失了,权力的问题被忽视。如果不向我们的院系、大学和学会存在的这种倾向挑战,我们就是低估了其中的危险。作为一个学科,体育社会学就可能从学院中消失,并且在学术倾向的影响下,成为体育工业和现状的拥趸。

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第二个危险起源于与后现代思想相联系

① 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是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体育社会学和运动科学与再造管理方向的教授。他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协会主席。约瑟夫是多家体育社会学杂志的编委,出版了关于民族认同、体育与移民和全球化等相关主题的著作。

② 凯文·扬(Kevin Young)是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体育社会学和运动科学与再造管理方向的高级研究员。2003年成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副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与体育相关的论文,主题为暴力与认同亚文化,是北美体育社会学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的相对主义。它否认可以验证的、逐渐累积的、可靠的社会知识存在的可能性(Tilly, 1997:29)。正如蒂利(Tilly)所言,这导致社会学的使命仅仅局限于社会支持和社会批评。此外:

它通常或者特别削弱了评估关于社会生活的种种观点的相对正确性的人际程序。作为一项与众不同的事业,它抨击了一切优越知识的宣称,从而驳斥了社会科学存在的一切理由。(Tilly, 1997:29)

对人类有潜在利益的知识的产生从总体上受到忽视,并且,社会科学家用以批判体育现状的根据被降低为一个意识形态正确性的问题。

体育社会学在实践中并非没有受到这对危险的影响。我们要正视这两个危险,否则,就会像蒂利所说的那样,“社会科学是在冒着浪费一代杰出知识分子的危险”(Tilly, 1997:29)。鉴于此,本书以及导言部分可以看作是致力于讲述这些危险的尝试,以及迈向体育社会学新的可能性和综合的一步。下面将详细论述我们的观点。首先是对社会学理论的需要;其次是关于理论思考的一些特征;再次是好的社会学技巧的特点;最后,我们将对本书的结构和主线作一简要说明。

我们为何需要社会学理论?

体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理论。实际上,我们在制造这样一个事实: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研究体育,仅仅是在描述和再现现状。我们把建立理论看作一个过程,此过程包括几个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希望之源”、向导和罗盘、朋友和同事、资料库和参考书、技巧、乃至终身学徒。下面让我们依次阐述。

在关于韦伯的一章中,哈特·坎特伦(Hart Cantelon)和艾伦·英厄姆(Alan Ingham)讲到了合理性和“铁的牢笼”这两个概念。正如坎特伦和英厄姆所言,对于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如何才能“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技术官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韦伯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深刻的见解。通过提供解释的工具,并且把个人经历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中,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中的限制和可能之事。其实,我们可以把理论理解为脚手架,以此来创建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解释。这会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民群众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并非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势下。通过重构历史,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如何从过去中产生。

在对体育竞赛的现行状况进行评论时,通过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类不必一直陷于工作效率模式的束缚中(Maguire, 2001)。在一定程度上,理论可以使我们提出体育和文化的新模式,从而形成坎特伦和英厄姆所谓的“下一代的希望之源”。如果理论是希望之源,那么它也是参考书和向导。在关于涂尔干的一章中,约翰·洛伊(John Loy)和道格拉斯·布斯(Douglas Booth)阐述了理论如何充

当资料的角色,从而使读者学会系统地重新阐述特定理论家的主张。这个过程涉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并且可以重新构想未来。作为同事和角色模范,理论家可以使我们重新掌握一种发现意识,并且对他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在韦伯看来,作为一种“职业”,理论家也可以使我们对他们的见解和技巧进行推断。为了说明阅读经典的理由,洛伊和布斯引述了希尔曼(Sherman)的观点,学生应该“给每种理论以公平的发言机会”。希尔曼(Sherman,1974:180)通过结束语“要全面了解我正在做的事情,我需要知道本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必须了解机会成本。为此,我必须阅读名家。”来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经典”的问题。社会学理论作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需要引起特别注意。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拓展知识面,增加可用资料的问题。我们要带着掌握社会学内在结构、弄清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想法来阅读理论。以结构化的理论描述方式来思考可以使学生了解社会学学科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使学生探究不同社会学实践的技巧。从整体上阅读理论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关于布迪厄的理论解读上,贾维和马奎尔(Jarvie & Maguire,1994)做到了这一点。布迪厄的理论既有益于其理论自身的“反思”,也有益于与其研究相对立的研究的反思,使体育社会学研究得到了加强。这一观点同样更广泛的适用于阅读社会学理论。阅读理论的时候,不要把它们看作是孤立的,而是要把它们看作是持续对话中的因子。布迪厄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说道:

举例说,如果你理解了韦伯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你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他们,并且会问一个思想家是如何使你领会另一个思想家的,为什么会这样,反之亦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之间的对立(讲课和论文中通常这样讲)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学的一致性可能存在于任何合理的观点中,它们之间的对立(可以这么讲)意味着出类拔萃的可能性。比如,很显然,韦伯能理解马克思没有理解的,因为马克思已经理解了他所看到的……倾听对手的声音会使每一个社会学者做得更好,因为看到他/她所看不到的,发现他的理解的缺陷对他们有好处,他自己发现不了这点的。(Jarvie & Maguire,1994:84)

注意,只有采取“全面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时候,我们才能掌握布迪厄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学的一致性。以此看来,我们要以成群或者成组的方式来阅读理论——不但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理论可以充当罗盘,作为向导。它不能也不应该提供“答案”。也就是说,答案不是现成的,而是理论和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是后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好的实践的特点之一。然而,理论的确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不得不问,哪些问题值得问。它也能使我们把这些问题按正确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进行“好的”社会学技巧和实践。

因此,借助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学科提出了什么问题,进行了哪些思考以及反映了什么现象。要理解现在,我们就必须知道作为一个社会学团体

我们了解了什么——我们要有精确的时空感。也就是说,要告诫学生避免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当代社会学家的逃避”。埃利亚斯指的是社会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内容局限于“此时此处”的倾向,而不去探究它如何产生于过去。同样,社会学家不了解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是如何产生的,就忽略了我们是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Elias, 1971: 165)。我们可以从同行理论家和同事那里学习大量现成的知识,并且在社会科学团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使这些知识得到扩展(Elias, 1971)。这些议题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知识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复杂问题。

这些言论听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切中了理论和知识争论的实质。我们要感谢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他为我们理解“科学革命”和范式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的理论成功促进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知识发展。争议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非连续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要追溯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学的背景,社会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例如体育社会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强调“合乎现实”的理论以及相对充分的有关体育的知识是如何得到发展和积累的。“合乎现实”的知识是指我们所展现的并非真相,而是接近于社会世界的真实状况。

任何已有的知识体系(包括体育社会学)都源于以往知识获得的漫长过程,并且是这一过程的延续,只有将其看作是知识发展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对它进行解释(Elias, 1971: 158-159)。我们认为这一论断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观点:一定要阅读理论,并且要以布迪厄和希尔曼所指引的方法来阅读理论。理论不仅仅是向导和罗盘,也是“模范同事”。

这里不是详述构成社会学知识基础的理论的意义场合。但是,要做到全面地阅读社会学理论,需要做一个重要的补充。没有一项特定的研究或者特殊的理论能够展现“真相”——包括这项工作。然而,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所有的理论或者特定的研究具有同等的价值。指出社会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合适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理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阐明非意识形态知识的增长以及这些知识是如何在先前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或者如何降低了前辈们对体育、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也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想重复关于知识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争论——显然,在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看来,那是错误的两分法。

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方法是将本书的内容视为对不同理论之间可以利用的大量现有的和潜在的相对充分的知识的反映。我们并不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平等的”,而是认为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在某些具体的方面比其他对体育世界的解释更好的知识。例如,社会科学家获得的关于足球流氓的知识远远优于政府机构或者媒体所提供的知识。实际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社会学家根据不同的社会学传统所作的开拓性研究标志着我们在对这种激烈对抗的根源的理解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更多地述及这种相对充分的知识如何反映并强化了社会学理论的总体结构。接下来,我们将引用埃利亚斯的话来巩固这一论点: